

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



FAGUOERSHISHIJI
WENXUECONGSHU

桂河桥



皮埃尔·布尔著 王文融译

(皖)新登字 04 号

法国 20 世纪文学丛书

桂河桥 [法]皮埃尔·布尔著 王文融译

责任编辑:江奇勇 装帧设计:丁 明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刷:安徽新华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36

印张:5 $\frac{5}{9}$

插页:2

字数:92,000

版次: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5000

标准书号:ISBN 7-5396-1195-2/I·1096

定价:3.9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译本序

尼科尔森上校的独特性

柳鸣九

“斯佳丽小姐并不美，可是很迷人”。

皮埃尔·布尔在当代法国文学中不见经传，可是却拥有一个独占优势的“强项”。

他之不见经传，是指他在几乎所有的法国当代文学辞典中，都榜上无名。虽然他也发表过不少作品，虽然他也曾不止一次获得了文学奖，但就其在当代文学中的实际品位来说，不过三、四流而已，以我所看过的几种法国当代文学史而言，没有一种论及过他，甚至没有一种提到了他。

他所拥有的一个独占优势的“强项”，那就是他的《桂河桥》。这部小说出版后，皮埃尔·布尔又将它改编成电影，由英国著名导演戴维·利恩执导，由素

有“千面人”之美誉并以其表演艺术而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的著名演员亚历克·吉尼斯出演主角，影片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于1957年一举荣获奥斯卡七项金像奖，其中，皮埃尔·布尔获“最佳改编电影剧本奖”。电影《桂河桥》，风靡全球，盛誉经久不衰，皮埃尔·布尔也名扬四海，以至小说《桂河桥》于1959年在法国又获圣伯夫文学奖一事，倒显得无足轻重了。

把这样一部出自“不见经传”的作家之手的作品列为“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的选题，特约请王文融同志译出，倒不仅仅是由于它被改编成电影之后享誉全球，主要是由于它在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文学中，的确要算是一本很独特的书。

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文学，人们常简称之为反法西斯文学，这是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有的文学品种。在法国，这种文学则被称为“抵抗运动文学”，只不过，抵抗运动文学的含义更较狭窄具体，指的是1940年至1944年法国被德军占领时期中产生的抗敌文学。不言而喻，在抵抗运动文学之前，法国也产生了反法西斯文学作品，它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的紧张形势与严重斗争在法国文学中的反映，马尔罗的《希望》就是其代表作。在抵抗运动文学之后，也就是在战争胜利后，有关二次大战的文学作品、反法西斯的文学作品，在法国则更如春潮一般

大量涌现，从战争中过来的人，似乎只要是稍有写作能力的，都拿起了笔记述与抒写在战争年代中的见闻感受，以至形成了二战题材文学的一次大繁荣，这个高潮直到六十年代才逐渐回落。《桂河桥》就是这一股文学潮流中一部甚为独特的作品。

说到独特，在全世界有关二次大战的文学中，整个法国文学这一部份就有点独特。按照一般的理解，既然是反映一次规模巨大、持续时间长的世界性战争的文学，其重要内容、甚至主要内容，不言而喻当是严酷的战时生活、激烈的军事斗争、双方紧张的较量、两种力量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对峙。事实上，这些内容在一些国家的文学中确占有显著地位，特别是中国读者所特别熟悉的，前苏联文学更是如此，它几乎就可以归结为枪炮声不绝于耳的《日日夜夜》模式。可是，法国文学却似乎有点例外，在这里，我们很少听到枪炮声。萨特的《自由之路》里，有玛第厄在钟楼上的十五分钟射击，罗贝尔·梅尔勒的《瑞德库特的周末》里，有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战争场面，此外，还有这里或那里的若干零星的枪炮声、轰炸声……如此而已，而且，所有这些都是在战后产生的文学作品中才有的。战争期间所产生的抵抗运动文学，其代表作竟是画面一片平静的《海的沉默》：巴黎的一所幽静的房子，一个个寂静的夜晚，一个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德国军官，面对着一个法国老人和

他年青的侄女高谈阔论，不乏主观真诚与由衷的建立友谊的愿望，还带点理想主义色彩，然而，他得到的反应是日复一日一言不发像海一般的沉默。要对这种独特性加以概括，那似乎可名之为精神抵抗性，在法国文学传统中，它可以溯源至都德的《最后一课》与巴雷斯的民族主义小说。

如果，《海的沉默》作为一种抗敌文学的代表作是很独特的话，那末，《桂河桥》作为一部战争文学作品独特性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

《桂河桥》的独特性就在于它塑造了一个在激烈尖锐的战争条件下行为举止非常规化的军人形象，主人公尼科尔森上校这个人物就是作品全部独特性的体现。

尼科尔森上校是东南亚对日战场上的一個英国陆军军官，率部五百人向日军投了降，成为了集体战俘。在中国的概念里，降将与逃兵、变节分子、叛徒都是属于同一个范畴的，虽然尼科尔森是在战争全局失利的条件下，执行上级为保全实力，避免势在必然的全军覆没而要求放下武器的命令才投降的，但在传统的、常规的观念看来，他显然与“不成功，便成仁”的理想军德是格格不入的，这首先就构成了他不常规的人格状态。

同样，在中国读者的观念里，监狱、牢房、集中

营、战俘营在很多时候都是另一种“战场”，这里同样有紧张、尖锐的矛盾、对立与斗争，往往是原来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在特定条件下某种形式的延续。尼科尔森既然统领了五百名部下，当然可以导演出一场场有声有色、甚至威武雄壮的战俘营斗争的戏剧。他的确是这样做了，但他斗争的目标与着力点却有点特别。他不是像我们经常在其他文学作品与电影里所看到的那样，按照战争中保全自己有生力量的原则，以务实的态度来进行战俘营斗争，却有些学究气、腐迂气地在横蛮无理、残暴粗野的日寇面前，去维护、争取与自己战俘地位互不相容的体面、尊严、待遇规格与分寸等等，如要求投降仪式必须有日军高级军官出席、要求日军对自己英国军官身份的重视，甚至为了争取这类“礼遇”宁可惨遭殴打，甘冒丢命的危险，而在物质条件恶劣、战俘受敌人虐待处于饥饿状态的情况下，又严格要求部下保持君子风度。

尼科尔森更不符合常规的表现是，他为日本军队建造了桂河桥。日军为了在东南亚扩大侵略，决定修建一条沟通泰国与缅甸的铁路以保证军需品的供给，桂河上的铁路桥就是整个工程的一个关键。日军强迫英国战俘担负艰苦的劳役。尼科尔森固然因坚持“军官战俘不能参加体力劳动、只能率领与管理自己的部下”之见而与日军当局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并险而遭到枪毙，但却终于为坚持这条原则而作

了重大的“让步”：由他管理士兵战俘，承担整个大桥的设计与施工，并保证如期完成。于是，难以理解的事发生了：在尼克尔森的指挥下，英国战俘发挥出自己的聪明才智，组织好自己的劳动，特别是在尼科尔森近乎苛刻的严格要求下，艰苦顽强地进行操作，终于如期把桥建成。

如果说，尼科尔森卖命造桂河桥是令人难以理解的，那么，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他对桂河桥的拚命保卫。英军特种部队深知桂河桥在战略上对日军的重要，派了特遣爆破组潜入日战区前来破坏。正当爆破即将成功时，尼科尔森发现了特遣小组的行动，竟挺身而出，与他们展开了搏斗，破坏了他们的预谋。最后，桂河桥保住了，而英军的特遣小组遭到了重大的伤亡，只剩一个人逃离现场。

按照一般的常识常理，尼科尔森不仅有些不符合军人的常规，而且，简直就落到了“为敌效劳”、“助纣为虐”的叛徒地步。不过，这个人物形象决非如此简单。首先，应该看到，他与叛徒显然有一个重大的区别，那就是他的所作所为都不曾丝毫为己与利己的成份，而都是执意从某些原则出发，并且，为了坚持这些原则，他置个人安危不顾，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忍受日军的残酷折磨，惨遭毒打、险而被枪毙，等等。应该说，他为了坚持与实践他的原则，的确表现出了某种难能可贵的自我牺牲精神。不过，问题在

于,他可遵循的是些什么原则以及这些原则存在什么问题。

尼科尔森所遵循的,是尊严的原则、文明化的原则、精神优越的原则。他在投降式中要求自己的部下军容整洁、要求有日军高级军官前来受降,是力求在残局全盘失利、自己受命投降的不得已条件下,尽可能保持英国战俘的体面;他以军人手册、国际法规为根据,力争日军对军官战俘有必要的尊重,也是在维护英国军人的尊严;他要求自己的部下士兵即便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也力戒小偷小摸,则是要保持英国军队的自尊与精神文明;他在日军面临建造桂河桥任务而束手无策的时候,担负起建桥任务并出色地、高效率地加以完成,是在显示英国战俘的智慧、能干、坚毅与勤奋,是在显示英国战俘文明化的程度与精神优越性;而他为了坚持自己那些尊严的要求与文明化的准则而寸步不让,宁死不屈,则又显示出了他的精神力量。

当然,尼科尔森所遵循的不是战争的原则,不是实战的原则。战争原则、实战原则是要尽可能地给对方以打击与破坏,尽可能地不给对方提供任何便利与机会,尽可能地重创与消灭敌人,而尼科尔森的所作所为,看来却与此相反。这使他成为了一个有争议的小说人物,凡按照战场上的军人标准来要求作品中军人的读者,对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是决不会

称道的。

然而，应该看到，尼科尔森接受命令、为保存实力而降后，实际上也就是放下了武器，退出了实战的战场，他不可能再以物质的武器来进行实战战场上的战斗，他的道德行为也就游离了实战法则的范畴。不过，他对自己还是有所要求的，他要求自己遵循另外的准则来进行手里没有卡宾枪的战斗。他作为战俘以后的所作所为，对他来说，实际上就是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在进行的另一种形式的较量与“战斗”，那就是文明化程度高低的较量、个人素质优劣的较量、人精神力量强度的较量，总之，是一次精神性的战斗。他以自己的自尊自重、精神力量与文明化的程度，向他面前强大残暴的法西斯日军挑战，他赢得了他所进行的这次“战斗”，他的尊严、坚毅、无私、无畏、文明程度、科技水平、领导能力、管理方法、办事效率，对照出、暴露出日军的野蛮、残酷、粗暴、低能、愚昧；他所建造的桂河桥，就是他所进行的这样一次较量的结晶，这样一座坚固、设施完善、外观漂亮的桥梁，竟在荒僻的山区里、原始的物质技术条件下得以建成，本身就是英军战俘所创造的一个非凡的奇迹。由此可以说，尼科尔森与他的部下在更高一个层次上赢得了胜利，在更高一个层次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作出了他们的贡献：他们证明了这次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是人道尊严与暴虐粗鄙的战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尼科尔森是一个带有英雄色彩的人物形象，而他面对着横蛮无理的法西斯军队坚持文明化规范的那种堂·吉珂德式的表现，则又使他带有一种不现实的、浪漫的情调。

实际战场上只能容许高度务实的作为，浪漫主义的妄动只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实战中只有高度务实的军人才能取胜，带有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的人是不足为训，甚至是要不得的。但是，浪漫主义、浪漫情调的人物在文学中却是容许的，要得的，而且往往还很得宠。皮埃尔·布尔不是在战场上打仗，他是在写小说。他有权不按战争的法则来写，而按文学的法则来写。他写出了尼科尔森上校这样一个人物的故事，以此证明了交战双方的文明与野蛮、高尚与卑劣、人道与反人道的对立。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的小说也成为了一部独特的出色的书。

这就是皮埃尔·布尔的辩证法。

1992年5月20日

目 次

尼科尔森上校的独特性(译本序) 柳鸣九

桂河桥 1

作者简介 王文融

桂 河 桥



不,这事不滑稽,反倒相当悲惨;他是大玩笑以往一切牺牲品的最佳代表。但世界是在作乐中运转的,因此它总的来讲仍是件体面的事。此外,他是一个通常人们称作好人的人。

约瑟夫·康纳德

第一篇

某些目光在东西方心灵之间看到的不可逾越的鸿沟或许不过是海市蜃楼。或许它是没有可靠依据的老生常谈的传统表现,这老生常谈有一天被居心叵测地改扮成措辞尖刻的概述,要为其存在辩解甚至不能引用人人皆懂的道理?或许在这场战争中,保全面子的需要对大不列颠人和日本人而言同样迫切,同样生死攸关?或许这种需要支配了一方的行动,而他们并未意识到,又同样严格,同样命中注定地左右了另一方的行动,恐怕还左右了各国人民的行动?或许两个敌人表面上针锋相对的行为不过是同一个非物质现实的虽有差别却无伤大雅的表现?或许日本上校佐藤的思想在本质上和他的俘虏尼科尔森上校的思想相似?

以上是少校军医官克利普顿向自己提出的问